毗陵我里,是苏轼对谁说的?

顾建军

"速归毗陵,聊自憩。此我里……"(毗陵即今常州)

这句话的出处,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,是苏轼写给章子平的信;另一种说法,是出自宋靖国元年(1101年),遇赦北归苏轼给章致平的回信。

实际上,这是同一篇尺牍。问题在于到底是苏轼写给谁的?"章子平"与"章致平",仅有中间一字之差,但确是两个人。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细致的考证。

文本考证

首先,从不同的文本,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出现的端倪。之前大部分的《苏轼集》《苏轼全集》《苏轼文集》等,都收录的是《与章子平十五首》,这封尺牍是第十三首。

后来,孔凡礼先生在《苏轼文集》(中华书局1986年版)、《苏轼年谱》(中华书局1998年版),曾枣庄、舒大纲在《三苏全书》、(语文出版社2011年版)、《苏东坡全集》(中华书局2021年版),都将《与章子平十五首》拆分为《与章子平十二首》《与章致平二首》《与人一首》。原《与章子平十五首(之十三、十四)》改为《与章致平二首》,并注明:以下俱北归。原《与章子平十五首(之十五)》改为《与人一首》。并注明了更改的原因:

"与章致平二首"原作"十三",意为此乃与章子平之第十三首尺牍。据《播芳大全》《云麓漫钞》(以下简称《漫钞》)卷九改。文中"致平"亦作"子平",同据上改引。

《与章致平》(二)。文题原作"十四",意谓此乃章子平尺牍之第十四首。案,此首与上首衔接,当为与章致平者。《云麓漫钞》谓苏轼于上首之后,"又写白术方,今在其孙洽教授君处"。此首之"白术一味"及该句句下注文"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"云云,似即所写之白术方。因据改。

《与人一首》文题原作"十五",意谓此乃与章子平尺牍之第十五首。味其内容,或是与章子平者,然未敢定。今改题"与人一首",附校于此。(孔凡礼:《苏轼文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6年版)

人物考证

其次,让我们来搞清楚"章子平"和"章致平"分别是谁?

章衡。子平名衡,即章衡(公元1025年—1099年),子平是他的字。《宋史》有专门的《章衡传》,"章衡,字子平,浦城人(今属福建)。嘉祐二年,进士第一。"

章援。致平名援,即章援,致平是章援的字。章惇(字子厚)之子,于苏轼为晚辈。《宋史·章惇传》记载:"惇敏识加人数等,穷凶稔恶,不肯以官爵私所亲,四子连登科,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,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,讫无显者。"

章惇。章惇(公元1035年—1105年),"字子厚,建州浦城人",北宋中后期政治家、改革家,最高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《宋史·章惇传》载:"惇豪俊,美姿容,博学善文。进士登名,耻出侄衡下,委敕而出。再举甲科,调商洛令。"章惇本是与苏轼、章衡同年进士。但以名字在他侄子章衡之下为耻,辞去了皇上任命官职的诏敕,"委敕而出"。又三年,章惇参加下一届科举,得第五名,进士及第。

由此梳理,章惇、章衡、章援三人的关系是:章援是章惇的第四个儿子,而章衡是章惇的族侄。

与苏轼关系考证

再者,章惇、章衡、章援三人都与苏轼有很深的交集。

苏轼与章衡。苏轼也是嘉祐二年(1057年)进士,两人同年进士及第,也是很好的朋友。苏轼对章衡之才,也是颇为赞赏,他在《送章子平诗序》中评价说:"子平以文章之美,经术之富,政事之敏,守之以正,行之以谦,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。"苏轼还曾这样评价章衡:"子平之才,百年无人望其项背。"因此,后人收录了苏轼写与章衡的尺牍《与章子平》有十余篇。

苏轼与章援。"援为苏轼门生,元佑三年进士第一。"章援参加科考时,苏轼是主考官,且将章援亲点了第一名。因此,章援可以说是苏轼的门生。

苏轼与章惇。苏轼和章惇早年是好友,后来两人的关系,随着政见的不同,慢慢疏远甚至成为政敌。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,苏轼属于旧党,章惇则属于新党。苏轼与章惇、章衡、章援三人的关系分别是:苏轼与章衡是同年兼好友,与章援是师生;与章惇则是同年,早年的好友,后期的政敌。

尺牍考证

理清楚了以上人物及人物关系,我们才能对这封尺牍的对象、时间、背景、内容等做一充分的考证。

关于尺牍的对象和时间。信的开篇即:"某顿首致平学士。"信中的结尾,苏轼又注明是:"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。六月十四日。"由此,可断定,此尺牍乃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四日所作,是写给章惇之子章援(致平学士)的。

关于尺牍的背景。苏轼写这封信的缘由和背景,与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(1101)获赦北归有关,涉及到元祐、绍圣时期的新旧党争,以及苏轼与章惇的政治斗争。

元符三年(1100)正月,哲宗去世,徽宗即位。九月八日,章惇罢相,知越州,靖国元年(1101)初,再贬雷州司户参军。与此同时,靖国元年(1101),苏轼获赦,得以北返。

六月,苏轼船次京口(今江苏镇江)。恰好章援在京口。章援知道父亲章惇与老师苏轼的恩怨,担心苏轼重新当政会报复父亲,于是写了一封信,请求苏轼饶过章惇。"辅佐君王的人,一言之微,足以决定他人的命运。"此事《漫钞》卷九有记载:"东坡先生既得自便,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,还次京口,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,其子援尚留京口,以书抵先生。"以下录援书全文,约千字。章援这封信写了大约千字,反复叙求见之意,并云:"迩来闻诸道路之言,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。"书称苏轼"固圣时之蓍龟",欲就其父惇之前途吉凶而穆卜之,其意望朝廷稍驰其父之罪,使得"东归田里,保养垂年",盖欲动轼之情,勿念其父旧恶,使"还朝廷登廊庙地"后为回护之。

苏轼看过章援的信,情真意切,才藻富赡,非常高兴,连连夸奖:"斯文,司马子长之流也。"子长是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的字。据《漫钞》卷九记载,"先生得书大喜,顾谓其子叔党曰:'斯文,司马子长之流也。'命从者伸楮和墨,书以答之。(书略)此纸乃一挥,笔势翩翩。后又写白术方,今在其孙洽教授君处。""先生得书"云者,谓苏轼得章援书也。

"十四日,答章援简牍,并赠援白术方,以备其父惇之用。"(《苏轼年谱》)于是,在六月十四日,苏轼写了这篇回信。

关于尺牍的内容。

苏轼在回信中写道:"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,虽中间出处稍异,交情固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,寄迹海隅,此怀可知。但以往者,更说何益,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"说我与你父亲有四十余年的交情,中间虽然有些龃龉,但情义并没有减少。

苏轼还安慰章援说:"主上至仁至信,草木豚鱼所知也。建中靖国之意,可恃以安。"从"建中靖国"的年号,可以看出宋徽宗希望平息党政的政治风向,让他不要担忧。

苏轼并未将自己年迈投荒、一贬再贬的痛苦归罪于章惇,更以"又海康风土不甚恶,寒热皆适中。舶到时,四方物多有,若昆仲先于闽客,广舟准备,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,自治之余,亦可以及邻里乡党"来安慰门生。海康即雷州治所,苏轼告诉章援说,海康这个地方还好,在这里生活并没有太大的风险,不必担心。

苏轼还许诺到毗陵之后,将自己写的《续养生论》抄写给章惇。

关于毗陵

苏轼在信中,两次提到了毗陵。

一句是"在海外,曾作《续养生论》一首,甚欲写寄,病困未能。到毗陵,定叠检获,当录呈也。"

一句是"自半月来,日食米不半合,见食却饱,今且速归毗陵,聊自憩。此我里,庶几且少休,不即死。"

苏轼这两次都是表达了到毗陵定居的决心和心愿。

实际上,苏轼北返抵达赣州时,就已经决计归常。"某已到虔州(今江西赣州),二月十间方离此,此行决往常州居住。"(《与钱济明十六首》之十)

写了这封信的两天后,即六月十六日,苏轼乘舟抵达常州,"东坡自海外归毗陵,病暑,着小冠,披半臂,坐船中,夹运河岸,千万人随观之。东坡曰:'莫看煞轼否?'其为人爱慕如此。"(《邵氏闻见后录》)苏轼全家入住顾塘桥畔孙氏馆(藤花旧馆),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十多天。七月二十八日,终老毗陵。

综上,经过考证与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"速归毗陵,聊自憩。此我里……"这句话出自靖国元年(1101年),苏轼写给章惇之子章援(致平)的信,即《与章致平二首(之一)》。

开国高校常州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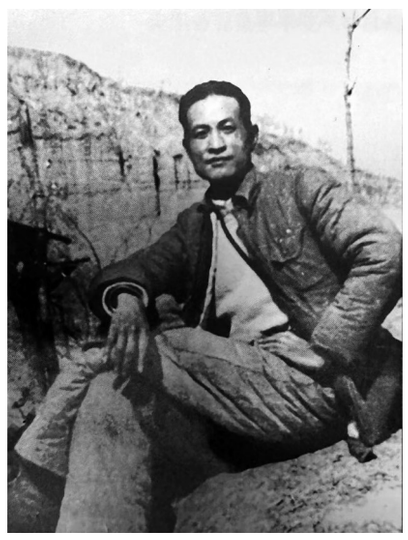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始人王诤

梅文岩 文\图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北校区内,苍松滴翠,芳草凝碧,青松绿草中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塑,只见他一身戎装又雍容儒雅,气定神闲又雄姿英发。他,就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,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,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(简称"西军电")开创者,开国中将,常州人王诤。

王诤,原名吴人鉴,1909年5月出生在武进戴溪乡天井桥村(现属武进区洛阳镇)。父亲毕业于常州政法学堂,一直郁郁不得志,家境逐渐衰落。吴人鉴童年跟父亲和叔父读了几年私塾,高中毕业后考进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,掌握了娴熟的无线电通信技术。1930年,在井冈山参加红军,改名王诤。

参军才4天,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毛泽东、总司令朱德就接见了王诤,表示了对开创红军无线电通信的高度重视和迫切期待。一周后,就用反"围剿"缴获的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,在红军总部江西宁国县的小布村架台工作,中央红军无线电台宣告诞生。1个月后,中央红军决定组建无线电队,任命王诤为队长。就任后王诤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出选拔红军战士,培养无线电通信报务员和机务员。经总部批准,1931年2月10日,无线电队开办的第一期训练班在小布村开学,有报务学员12人、机务学员5人。开学那天,朱总司令亲临讲话。毛总政委也多次给培训班上党课、作时事报告。



1945年,在延安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任校长兼政委时的王诤。

1955年,王诤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。

在中央苏区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当时技术含量很高的培训班,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缺少教员,王诤亲自给学员上课;没有训练器材,王诤自己动手,用木块、铁片制作电键,用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。训练班历时4个月,培训出我军第一批报务、机务员。这一期训练班也成为"西军电"的诞辰。此后,培训班次和人员不断增加,训练班扩建为"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"(后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),王诤首任校长,这是他第一次担任"西军电"校长。培训出中央红军近200名无线电通信人员。

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"围剿"失利,红军被迫战略转移。就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934年9月,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兼通信团团长的王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体现出他革命理想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。此时的红军通信学校改名为"红星第三大队",随主力出发。长征途中,学员们仍没放弃学习,而是"边打边学,边走边学",战斗间隙坚持开课,行军途中把学习内容挂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,师生、同学之间互相提问、背诵电码、练习英语对话,成了真正的"走读生",长征过草地途中举行了毕业典礼。

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,原红军通信学校与陕北无线电训练班、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,组成"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",时称"延安通校",延安期间学校共培养了800余名学员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,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成为党中央、中央军委连接八路军、新四军以及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神经中枢。由于抗战需要,1944年,"延安通校"扩建为"电讯工程专科学校",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的王诤再次出山,兼任校长、政委,这是他第二次出任"西军电"的校长。

解放战争全面展开,军委三局在王诤的领导下进入了战时体制。为适应战争发展的形势,1948年5月,撤离延安的"延安通校"和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、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、军委三局电信队、军委气象队进行合并,在河北获鹿县成立了"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",学员多达近1500人,成为解放区最大的无线电通信学校。中央再次任命王诤兼任"华北电专"的校长兼政委,这是他第三次出任"西军电"的校长。如今,学校旧址还保留着王校长当年办公的起居室,一方小桌,一盏油灯,一张土炕,使人联想起他为了人民军队通信教育事业殚精竭虑、夙兴夜寐的情景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这所由王诤亲手创办、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三任校长的学校迅速成长发展,1958年,从河北"西迁"到古城西安,校名几度更迭,1988年,更名为"西安电子科技大学"至今。1959年,成为新中国第一批20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,1997年,成为全国211工程建设大学,现有2个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。

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,王诤曾凭半部电台中收听到敌军的蛛丝马迹破解敌情,使红军一举粉碎了第二次大"围剿";长征途中,在张国焘企图挟持中央的危急时刻,他亲自上机长时间不间断地寻呼,终于和红二方面军取得了联系,使局势转危为安;解放战争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,王诤布下了"中间固定,两头移动"的"八卦"战略指挥通信网,保障了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安全及时;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期间,正如周恩来副主席所说:我们一不发人,二不发枪,三不发粮,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;上世纪60年代初,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—2高空侦察机频频进入大陆领空侦察,王诤组织团队研究出用电子技术手段打"空中游击战"的战法,先后击落4架来犯的敌机……他开创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的无线电通信、无线电侦察、新闻广播、气象雷达、航空航天、电子工业、无线电通信教育等众多领域的辉煌事业,毛主席曾称赞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。他是中共七大、八大代表,十大、十一大中央委员。1955年,他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,这是江苏籍开国将领中唯一的最高军衔。

远方有海 (水彩)大苏

难忘的菱角

徐志俊

秋天儿时的农村,是丰收的季节,也是孩子们有口福的时节。在众多采摘的美味中,最让我难忘的,非菱角莫属了。

我的故乡在常州市金坛区的黄庄村。村后有一片近千亩的开阔水面。数不清的狭窄垛田,把千亩水面分割成了一条又一条的沟渠。垛田上,长满了芦苇。秋天芦苇婆娑,不知名的鸟儿,欢唱着、跳跃着,发出绵延不断的"叽啾"声。它们时而在芦苇上歇息,时而又猛地冲向蓝天。

沟渠里水草丰茂,鱼虾成群。良好的自然生态,孕育出了肥沃的有机河泥。这些河泥,成了菱角们理想的家。

种菱角是一劳永逸的事情。选定一块水面播下菱种,待菱角成熟时,留下一部分优质的菱角不要采摘,待到"菱熟蒂落",落到淤泥里的菱角自然就成了来年的菱种。

每年的秋季是菱角成熟的季节。采菱角,在儿时的老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。生产队长一早就吹起了哨子来召集村民。村民们习惯把采菱角叫作"翻菱盘"。仔细想来,确实有几分道理。因为,采菱角时需要把整菱盘翻过来采摘。这样做的好处大致有两个:一来,把菱角底朝天,采摘起来方便;二来,可以区别其他未采摘的菱盘。

采菱角的工具是椭圆形的如小船一样的大木桶,也叫菱桶。由于菱塘里布满菱盘,用大木桶比船要更为灵活一点。菱桶宽约七八十厘米左右,长约一米五左右,高约六七十厘米左右,没有船桨,通常采菱人会架一只小板凳,坐在菱桶的前端,以双手为桨划行。

驾驭菱桶需要极高的技术,稍有不慎就会"人仰桶翻"。

菱塘里菱藤密密麻麻,互相交织,仿佛一张巨大的网,把整个菱塘拉得满满当当。采菱人在如织的菱塘里"杀开一条菱路",然后再沿着这条"菱路"向整个菱塘辐射开来。不到半天工夫,整个菱桶就已经被菱角压得不堪重负了。这时,采菱人会把这些菱角到岸边卸掉一批,再重赴菱塘。

记忆中的菱角分两种:一种是红菱。红菱外壳呈淡红色,红菱的肉含水多,含淀粉少,味甘甜,宜生食;另一种是大青菱。大青菱个头较大,皮呈绿白色,肩部高隆,肩角平伸而粗大,腰角亦粗。略向下弯。颇像元宝形状。大青菱也可生食,但煮熟后味道更佳。

煮菱角是个技术活。父亲在水乡生活了一辈子,是煮菱角的好手。他煮的菱角,外壳不破皮,菱肉熟而不烂,真可谓是恰到好处。父亲说,煮菱角时,一定要把红菱与大青菱分开,否则,红菱烂了,大青菱还没熟。

煮菱角时,先要淘洗一番,洗去菱角上粘连着的浮萍,以及腐烂的菱叶等。待洗净后,倒入锅中,加水没过菱角。大火烧开,小火焖十几分钟,待到出锅时,把它们倒入竹篮之中,用大盆的冷水猛"激"一下热菱角,这样菱角就不会破皮了,而且很有"卖相"。

菱角除了带壳煮这种吃法外,还可以剥皮后跟一些荤菜搭配起来烧。鱼烧菱肉,是一道不错的美味。鱼的鲜味,裹挟着菱肉的粉糯、甘甜的味道,让这道菜成了秋天农人们招待贵客的一道佳肴。

待到我上学的时候,国家已经分田到户了,我们家分到了几条沟渠,父亲在沟渠里也种上了菱角。到菱角采摘的秋季,父亲四五点钟便已把菱角采好。然后把它们装上自行车,踏过村口的那条石子路,把它们运到金坛的菜场售卖。儿时的小人书、新华字典、蜡笔……都是菱角卖掉后,父亲带给我童年的礼物。

家在桃花盛开处

(篆刻)
刘维俭